

曾国藩与容闳“教育计划”

郭汉民

同治十一年（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启航。此后按年续派，到1875年共派120名12—15岁的幼童赴美留学。这是“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留学史上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容闳为促成这一创举操劳奔走、孜孜以求，发挥了无可争辩的积极作用。其实，这一创举的真正主持者是曾国藩。

一

我国第一个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学位的容闳，还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他对于“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美国比封建的中国要优胜得多，文明得多。只有按照美国的方式和榜样改造中国，中国才能焕发生机、繁荣富强。他坚信：“借西方文明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①为此，必须组织中国幼童赴美留学，这就是容闳“教育计划”的核心内容。

容闳“教育计划”的形成是由两方面的情况决定的。一方面，容闳从小学到大学受的是系统而纯粹的资产阶级教育，使他崇尚西方文明；另一方面，他有着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对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此书。

西方文明的崇尚使他愈益感到祖国的落后和封建制度的腐败，愈发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计划”，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之后，放弃在美国寻求优越职位和优厚待遇的机会而扬帆回国了。

容闳从 1854（咸丰四年）回国到 60 年代初，为实现其“教育计划”，几经周折，屡次失败。当时的中国社会尚缺乏实现容闳教育计划的条件，容闳个人由于种种机缘得以留学美国。但要想组织多数中国青年子弟留学美国却是一项极为复杂、极为困难的事业。这既有赖于中国社会有派遣留学生的现实要求，又需要中美双方国际关系为此提供现实条件，还必须中国政府当局中有强有力的人物出而提倡与主持。只有当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容闳“教育计划”才能变为现实。

二

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渐次展开了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兴办近代军事与民用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举办需要一大批掌握外国语言文字与各国情况的外交人才和翻译人才，需要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造就这些人才有赖于兴办新式学校和向外派遣留学生。1865 年薛福成曾向曾国藩建议：“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其杰出者，旌以爵赏。”^①正是洋务运动对人才的需求将派遣留学生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其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思想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采西学”、“制洋器”，师夷长技，力求自强，日益成为进步人士的共识。1866 年和 1868 年，清政府先后派斌春和志刚、

^① 薛福成：《乙丑上曾侯相书》，《筹洋刍议》第 20 页。

孙家谷出国游历，考察访问了欧美 10 多个国家，初步改变了对外部世界闭目塞听的状况，“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并且看到出国留学在欧美已成风气，“凡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余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中国欲徐图自强，当仿效各国，派学生出洋肄业。而且，志刚、孙家谷出访美国，“已导之先路，计由太平洋乘轮船迳达美国，月余可至，当非甚难之事”^①。可见，随着中外交往的开展，随着向西方学习思想的兴起，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已被人们所认识。

再次，1868 年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第 7 条载明：“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以在美国一体照办”^②。这就为中美两国互相派遣留学生和在对方土地上设立学校提供了条约依据。当美国公使 1871 年春路过天津时，李鸿章与之商议派幼童前往留学之事，希望其转达本国，妥为照料，美使欣然许诺。曾国藩由此认识到派留学生一事“固外国人所深愿，似于和好大局有益无损”。可见，实现容闳“教育计划”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条件也已具备。

第四，最关键的一点是 60 年代起，中国政治舞台上开始出现开明而务实的洋务派，其头面人物曾国藩、李鸿章以及丁日昌都大力倡导留学教育。容闳受知于曾国藩、丁日昌更使其“教育计划”有了现实的可能。

① 曾国藩《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

② 志刚：《初使泰西纪》，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5 页。

容闳多年在上海等地的交游，使他结识了不少与洋务派有密切联系的当代科技人士、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洋行买办等。为了结交洋务派大员并借助他们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抱负，容闳于1861年即托人致函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希望引见于曾国藩。1862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枪炮船只，并规划修建一个更大的兵工厂，急切需要派人出国选购机器，得知容闳在美多年，识广友众，也设法予以罗致。容闳于1862年应邀到安庆拜会了曾国藩，曾“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以为其筹办洋务所用^①。1863年10月，曾国藩正式委派容闳携巨款赴美购买机器；1865年10月，购回机器一百数十余种，交上海制造局取存备用。对此，曾国藩非常满意，称他“颇有胆识”，“不避险阻，涉历重洋”，“实与古人出使绝域，其难相等”^②，专折为之请奖，保授以候补同知，分发江苏。容闳还曾建议在江南制造局附设一兵工学校，得到曾国藩的支持，并得以实行。容闳曾高兴地写道：“予自得请于曾文正，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既略著成效，前者视为奢愿难偿者，遂跃跃欲试。”他庆幸自己能见知于曾国藩：“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容闳结识曾国藩不久，还结交了丁日昌。1863年9月，“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应李鸿章奏调从广东到上海办理上海洋炮局事务，与奉命出洋采办机器的容闳相识。到容闳携带机器回国时，丁日昌在上海道任上，主持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容闳所购机器设备奉命并入江南局，容本人也被留下担任译员。容闳后来回忆说：“此时任上海道者为丁日昌，与予亦颇投契。丁之居官升迁甚速，由上海道而盐运司，而藩司，未几竟升为江苏巡抚。予亦藉丁之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一。

② 曾国藩，《出洋委员容闳请奖片》，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力，旋得加衔而带花翎。”他称丁为“老友”、“与余志同道合者”。

同治九年（1870），丁日昌奉命赴津会同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奏调容闳担任翻译。此间丁曾多次同曾国藩商议，拟选派聪颖幼童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 10 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并且建议陈兰彬与容闳可以担当携带幼童前赴外国肄业的重任。曾国藩深韪其言，答应联合李鸿章上奏清廷。丁日昌怀着十分急切和欣喜的心情连夜告知容闳，容闳记述说：“一夕，丁抚归甚晚，予已寝，丁就予室呼予起，谓此事已得曾公同意，将四人联衔入奏，请政府采择君所条陈而实行之，予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

三

从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四日丁日昌到达天津起，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病逝止，为派遣留学生一事，曾国藩曾先后 5 次上书清廷，积极倡导，竭力主持，发挥了最关键、最重要的作用。

同治九年九月十六日，曾国藩上书清廷，论证了派留学生出国肄业的必要性。他赞成丁日昌的建议，主张派留学生赴泰西肄业，为 3 年蓄艾之计。他还奏调原在直隶“襄助一切”的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随他到江南，暂操练轮船，将来实力讲求悉心规画肄业西洋各事。可见，曾国藩此时已开始为派遣留学生作舆论和组织准备了。

同治十年正月，曾国藩又一次上折奏请派遣留学生。五月九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致书总理衙门，指出西人学求实济，新理新器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师其长技，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

洞澈。他们还分析了派送留学生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条件以及对和好大局的利益。鉴于选材与筹费的困难，他们提清总理衙门主持大计，“志在必成，虽难不惮，虽费不惜，日积累月，成效渐有可观”。

在得到总理衙门“以为可行”的函复之后，曾国藩与李鸿章于同治十年七月初三具奏，说明派聪颖子弟出洋留学的缘由，强调其重大意义，附呈章程12条，规定了选派留学生出洋及教学管理各项事宜。七月底，奉旨依议。至此，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一事才算大局已定，容闳“教育计划”的实现已是指日可待了。

为了进一步落实挑选幼童赴美留学的有关事宜，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曾国藩与李鸿章又联衔上了《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将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6条并列，重申挑选幼童的标准、程序及出洋后的管理原则，留学经费的拨付及开支办法。奏折请旨饬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驻美国经理一切事宜，决定派遣五品衔监生曾恒忠为翻译，光禄寺典簿附监生叶源浚为中文教习随同出洋。幼童的挑选及出国留学的训练则由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负责，由盐运使衔分发后补知府刘翰清主持，对出洋委员及驻沪洋局刊给关防以资信守。这样就进一步从组织上保证了选派留美幼童工作的正常进行，为容闳“教育计划”的实现进一步铺平了道路。这年七月初九首批幼童30人在陈兰彬等人的带领下乘风破浪向新大陆进发，容闳先期赴美迎接，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中美文化交流史的新的一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为之呕心沥血，为之倡导呼吁，为之主持擘画的曾国藩，却没能亲眼目睹这一创举，他在首批留美幼童开航之前的5个月，就因积劳成疾而与世长辞了，容闳后来曾伤感地写道：“曾之逝世，国家不啻坏其栋梁，无论若何，无此损失巨也。时预备学校开学才数月，设天假以年，使文正更增一龄者，则第一批学生已出洋，犹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

考察曾国藩等商请派送幼童赴美留学的全过程，可以看到曾、李、丁3人都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积极倡导者，没有他们的积极支持，容闳“教育计划”的实现是不可能。容闳后来把他们3人的肖像都挂在美国哈特福德留学事务所的墙上，并“教育学童们把这三个人敬奉为他们的恩师”。美国友人当时指出：“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姓名应该铭记，也将被铭记，而且不仅是在中国。”3人之中，提议最早的是丁日昌，主持最久的是李鸿章，而在初创阶段主持最力的当属曾国藩。容闳后来说过：“文正种因虽未获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中华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容闳对曾国藩的评论或有过誉之处，但他把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之果归因于曾，肯定曾氏遗泽于莘莘学子的功绩，及其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则是言之有据、事实求是的。

曾国藩能成为首批留美幼童选派工作的主持者，成为近代留学运动的奠基人，与他的爱国热忱与政治远见也是密切关联的。还在与太平天国殊死搏斗的1861年，曾国藩就看到了一个比太平天国更难对付的敌人，即“纵横中原”的“夷人”，并因“无以御之，为之忧悸”而夜不能寐。^①1862年他写信给李鸿章，希望李“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②，与之联手发起以“窃制器之术”为主要内容而以雪耻自强为基本宗旨的洋务运动。此后，他的一切洋务举措都无不与抵制西方侵略、谋求国家富强相联系。其力主派留学生出洋肄业的唯一目的正是这些学生业成而归可“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上奏请派留学生之时，已是久病缠身，精力日衰“自度难策后效”了。他奏请幼童出洋

①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69页。

② 《复李鸿章》，《曾国藩全集·书信》五，第3457页。

留学生尚未出国，他就去世了。当时的中国风气未开，挑选中华聪颖子弟送到遥远的“夷狄蛮人”那里去拜“洋鬼子”为师，学习非科举考试所需的“声光电化”，不仅要冒“以夷变夏”、“师敌忘仇”的政治风险，而且要顶住习惯势力的巨大压力。因处理天津教案而颇遭物议的曾国藩之所以不避险阻主持选派留学生，他所考虑的仅仅是洋务事业“渐次拓充”的需要，希望“异日有名将帅出，俾之得所凭藉”^①。他预计这些幼童留学回国之时，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这些充分体现了曾国藩为国家作育人才、为民族长远利益尽心谋画的政治远见和爱国情怀。

（本文作者：湖南师大历史系教授）

^① 曾国藩《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